

# 欧洲各国

## 移民历史、文化与治理

OUZHOU GEGUO YIMIN LISHI WENHUA YU ZHILI

刘齐生 毛国民 等 著



海外



人民出版社

# 欧洲各国 移民历史、文化与治理

OUZHOU GEGUO YIMIN LISHI WENHUA YU ZHILI

刘齐生 毛国民 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孙文君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各国移民历史、文化与治理/刘齐生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355-3

I. ①欧… II. ①刘… III. ①移民-研究-欧洲 IV. ①D75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3030号

## 欧洲各国移民历史、文化与治理

OUZHOU GEGUO YIMIN LISHI WENHUA YU ZHILI

刘齐生 毛国民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河北文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3.5

字数:21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20355-3 定价:3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和欧盟移民危机管理研究  
创新团队项目成果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欧洲融合与殖民扩张	16
第二章 移民政策与失控的劳工移民潮	22
第三章 非常规移民与欧洲堡垒的艰难抵抗	30
第四章 法国共和同化模式新趋势	39
第五章 德国分化排斥模式的后果	52
第六章 英国多元文化模式新趋势	68
第七章 瑞典多元文化模式新发展	83
第八章 意大利移民治理模式探究	94
第九章 西班牙移民治理模式	109
第十章 希腊自由主义移民政策	123
第十一章 奥地利移民治理模式演变	141
第十二章 瑞士灵活移民政策	154
第十三章 波兰的移民现状	169
第十四章 克罗地亚的移民进程	182
参考文献	193

## 绪 论

国际移民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起步虽晚,但并非空白,以往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从 21 世纪起,我国学术界也逐渐开始研究在欧美发生的移民大事件,关注欧洲国家的国际移民政策(陈志强 2008:20),但总体上我国的国际移民研究还缺少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究其原因,我国一直以来缺乏迫切的需求,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具有“安土重迁”的特征,对迁移普遍畏惧,对土地高度依赖,除了南部少数省份有国际移民输出外,中华民族人口外迁频率和外迁行为与欧洲民族相比均不显见;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因为意外事件接收过大量华人、华侨,以及周边国家战争造成难民短期越境行为外,我国未面临严重的外国移民输入问题;三、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和个人不仅很少有跨国境的迁移行为,连国境内的迁移现象都少见。以上种种原因使我们对迁移问题,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现象关注不够,也对其中的利弊关系缺少一个全面的认识,对欧美国家早已施行的移民管理政策缺乏认识,较欠缺涉及移民治理的长期策略。

近些年来,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日渐深入,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我国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在国内引进外资,在国外投资办厂,到国外学习、旅游或者定居,短期和长期国际迁移活动不断发生,这使得我们有必要细致、深入研究国际人口迁移问题。而对欧洲历史上的典型国际迁移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将不仅会让我们认识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活动,以及它们对世界的影响,而且也同时契合了我国当前的国际战略。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战略”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些思想针对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和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的客观发展状态,同时还针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各国面临许多共同威胁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不可能独自应对的具体问题。这一国际问题治理思想为我们研究国际移民现象和各国移民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也是本书自始至终认识问题的思想基础。

世界上到处都发生过并正在发生迁移活动,而本研究选取欧洲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人口迁移和欧洲各国的移民治理作为研究焦点,原因在于,涉及欧洲移民问题的历史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时期是欧洲向外大量地移民,而另一个时期又是大量非欧移民涌向欧洲,以欧洲为中心的移民输出和输入活动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变化,形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事实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别引起了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注。而就在近期,西亚地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道主义危机,大批战争难民涌向欧洲,欧洲的移民问题又一次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全球移民话题,“文明冲突论”“反全球化言论”一时之间甚嚣尘上。我国媒体也对欧洲难民危机进行了大量报道,包括学者和普通市民的各界人士均积极参与讨论、发表看法。就非涉华国际事件而言,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成为我国近三年来最受民众关心的国际事件之一,被视为“冷战后第二次最迅猛难民潮”(方华 2015:4)。我国民众关心欧洲移民和难民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传播快捷,让许多人看到了难民和当事国面临的困境,从而唤起了内心对逃亡的先天性恐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在别国遇到问题的时候,中国很难独善其身。所以,针对这一事件出现的各种言论,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不足为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这些观点予以重视,揭示观点背后的逻辑,以理服人。纵观媒体言论,特别是社交媒体,人们针对移民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极具情绪性,往往先入为主,只接受单一说辞,不了解欧洲接收国和亚非来源国的客观现实,更遑论从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另外,虽然学术界也已就欧洲难民危机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有些研究涉及欧洲难民政策和法律的分析,也有的研究欧美历史上产生的以及现存的各种移民融合模式,例如,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德国的分化排斥模式和英国的多元文化模式等,但是很多研究都是

着眼于一个国家,很少全面分析欧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与难民、移民管理关系,以至于难以全面把握“移民”这一充满情绪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有代表性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在欧洲移民历史大背景下,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尽可能全面地比较研究欧洲各国在国际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把握欧洲各国社会发展走向,为我国与欧盟和欧洲国家交流及今后我国可能面临的同样的国际移民治理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移民中心的资助,同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梁宗岱学术研究中心也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 一 欧洲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重点问题

《大美百科全书》将迁移定义为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大美百科全书 1994:64)。另有文献认为,迁移是“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社会科学大辞典 1973:170)。而按照联合国《人口学词典》(1992),迁移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上面三种文献都共同强调了迁移的“永久性”和“跨距性”。上述定义与欧洲一项认知调查研究结果中人们对迁移的认识相一致。据该调查,在回答“什么是迁移”这一问题时,欧洲人往往给出以下答案:“移居邻国”“横跨大西洋”“身边有不同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外国人”等,答案虽然不尽相同,但以“民族国家”为界设定的迁移思维框架是完全相同的(Klaus Bade 等 2008:28)。所以,欧洲民众一般把迁移理解为从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而国际移民的典型特征是他们与目的国主流社会人群不一样的外貌长相、行为举止、风俗习惯和语言。本书同意上述各种迁移定义对人口的时间流动和空间变化的描述,并根据现今欧洲民



众对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解,把人口国际迁移看作是跨国界的行为,甚至是跨大洲的流动,并将本研究定义为欧洲人认知上的“国际人口迁移”研究。

迁移是人类的普通行为,恰如出生、繁衍、疾病和死亡,人类迁移与生俱来,而且每天都在发生。人最初的祖先就是在世界上不断迁徙,才逐渐遍布整个地球。现今更是每年都有大量人口因职业或环境等因素变更居住地,越来越多的当代人发现,自己其实也处在流动性的过渡期里,“每天、每月、每季,迁移的人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迁移的人口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人始终处于不停地流动和上升的状态中”(Vaughan Robinson 1999: xi)。所以,迁移作为人类的习性“贯穿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全景”(曼宁 2014: viii)。

根据史料记载,人类最早的移民可以追溯到4万年前,早期人类的迁移行为与动物的生物属性并无二致,人类同样需要通过迁移获得或者改善生存的必要条件。随着人类学会培育庄稼和饲养动物,人类迁移的动因才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改善生活,还为了逃避人为的迫害,或者为了摆脱难以改变的社会地位。从迁移性质上看,近代人类的迁移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自然灾害、战争而造成的被动迁移,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人口迁移多属于这一类,是生存型迁移。另一种迁移发生在和平时期因经济发展而引发的自愿性发展型移民,其目的主要在于改善生活条件和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典型的发展型移民始于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大洲开展的殖民活动,它引发了欧洲人口的大迁移,数百万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美洲、澳洲寻找更多的机会,移民的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这些欧洲国家的军队和冒险家也开始入侵亚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吞并、占领土地。欧洲人的迁移活动和征服行为引起了世界人口、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变,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分布,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改变了世界语言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居住在欧洲以外的白种人已经占到了白人人口的21%(梁茂信 2011: 5)。所以,欧洲的发展型移民是西方研究欧洲国际移民的要点,同时也是我们从移民研究的角度深刻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

根据不同移民类型,中外欧洲国际移民研究多把欧洲近代国际移民潮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移民从欧洲迁出,时间

跨度从 1500 年一直延亘到 1815 年;第二个时期是 1815 年到 1945 年,欧洲已然是人口输出大洲,在不断地向世界殖民中改变世界的人口分布;第三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欧洲已经转变为人口输入的大洲,成为吸引移民的中心(梁茂信 2011:5-6)。这样的划分是一种对移民历史粗线条的形式划分方式,显然并未触及历史的核心内容。通过阅读国内外资料,我们发现,除了以上三个时期的欧洲移民历史形式划分外,人们也都同意 1850—1930 年是近代人类历史上自主移民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一时期有约 6000 多万欧洲移民迁居世界各地(Brüggemann-Buck 1999),还有多于此数量的欧洲人在欧洲内部迁移。他们移民的目的是为改善自身经济状态,重建社会地位。不仅如此,此时期的欧洲人口流动带动了欧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工业化革命,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兴起的第一次物质、资金和人口全面流动的全球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次运动才戛然而止(Bade 2008:29,曼宁 2014:155)。这一时期也被西方精英视作西方文明向世界扩张的黄金期。亨廷顿比较能代表西方精英对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亨廷顿 2002:176)。亨廷顿在说这句话时,是对历史上欧洲移民迁移美洲、澳洲等区域的第一次全球化的赞扬,并且通过这句话把“人口输出”看作了国家“崛起的唯一重要衡量标准”(李明欢 2010: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又掀起了新的移民潮,而且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欧洲高速发展的经济对世界各地移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欧洲从移民输出国变成亚非移民输入国,北美也从接收欧洲移民变成接收亚非移民,国与国之间的货物交流、国际投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世界已然进入了第二次全球化时代。但是,在公民权和迁徙权方面,却形成了新的全球和国家等级。一方面贸易和投资促进了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它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作用。有些人大获其利,有些人穷困潦倒,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五十亿贫穷人口的第三世界,并且直接导致人口从穷国向另外十亿人口的富国迁移(Paul Collier 2010:17)。与此同时,欧洲等发达国家不断设置障碍,力图阻止移民和所谓贫困输入。国际移民政策在族群和来源地方面的区别对待日益明显。为了休闲和就业,西方国家公民可以自由周游世界。具有技能和管理专长的

“社交舱”一族就是这种长期迁移机会不平等道德最佳的写照(Hirst and Thompson 1999:31)。富人们会鼓励孩子在空闲的时候背包徒步环游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们想在那里待上一周半月,就可以在那里找工作,享受完异国情调后再回到家乡生活。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则无福享受这种自由随意的国际迁移,他们中只有那些具有发达国家合意之技能的人才能够到发达国家工作,另有一小部分人只能设法制造避难的理由留下来。大部分为了追求更好生活或维持经济生存打算迁移的人面临重重困难,他们只能求助蛇头甘冒风险、不计成本偷渡到西方国家。对于今天这样的人口流动,在许多西方人眼里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反向全球化”,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西方社会对日益增长的、数量庞大的亚非移民忧心忡忡,更关注移民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所谓宪法中的公民权和迁徙权则比较少提及了。西方国际移民的研究视角也从迁移动因转向移民治理,从个体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转向社会主流群体对外来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社会主流群体对日益增多的新移民国家的认同危机问题。亨廷顿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在19世纪,欧洲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但是在20世纪末则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亨廷顿2002:176-183)。在西方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对丧失工作、安全威胁、文化侵蚀忧心忡忡,惊呼移民政策已经失控,恐惧这种非西方向西方的人口流动的当代国际移民格局。西方社会意识里,这种大量非西方人口的流动意味着非西方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全球移民危机。德国前财长绍伊布勒更是直白地把2015年的难民潮称为“德国与全球化的第一次交合”,德国现总统施泰因迈尔就在不同的场合引用前总统高克的话说:“我们的心宽广无边,但我们的接纳能力有限”。但也有学者冷静地指出,21世纪的移民是一种“倒置的帝国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后果。他认为,穷困国家的年轻人口大量迁移西方,不应仅视为西方国家的负担,更应视为对穷困国家的再次掠夺。失去了年轻人口的穷困国家发展将难以为继,数十亿人口的脱贫遥遥无期(Paul Collier 2014:17)。

对于今天的全球移民潮现象,我国学术界没有缺位。通过大量官方数据,李明欢评估了全球移民状况,不仅考察移民接纳国家,也分析移民输出国家和

移民自身,提出了迁移的现实和历史影响问题。她认为,“全球化时代重要的观念性变革之一是人力资源的全球观。有效疏通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渠道,妥善安置劳动力的跨国务工,将有可能使移民个人及家庭、移民接纳国及移出国实现共赢共荣”(李明欢 2005:46),同时她还指出,“个人跨越地理上的边界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跨越政治、文化甚至种群边界的迁移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如果人口跨国流动达到一定规模,那么,其对移出国及移入国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既可能爆发即时的突发效应,亦可能如潜流般延续几十年、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李明欢 2005:47)。

除了从总体上探究迁移问题外,我国的欧洲国际移民研究重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某个移民热点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看法和治理策略;二、对欧洲华人、华侨的生活和历史贡献进行研究;三、对欧洲国家移民和难民政策进行研究,探讨法律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最早专门研究欧洲移民的文章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但诚如沈雁南所言,直到 2007 年宋全成著作的出版,我国才有了第一部关于欧洲移民的研究专著(沈雁南 2008:163)。宋全成按照德国学者克劳斯·巴德(Klaus J. Bade)的移民史观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移民历史进程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整理。作者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从移民类型学的视角上看,世界人口自二战后已经从原来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变为世界其他地方人口向欧洲流动。宋全成把战后欧洲移民划分为“回迁移民”“外国劳工”“难民”和“非法移民”四大主要类型,并据此将欧洲战后的移民进程分为四个特征鲜明的移民阶段,即以欧洲国家殖民地宗主国人民回迁和殖民地移民到西欧宗主国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以招募外国劳工为特征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和以政治避难为主要特征的来自前苏东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以及以回归西欧为特征的来源东欧国家的经济移民、巴尔干战争难民和非法移民大量涌入为特征的第四次移民浪潮。以上划分对我们理解欧洲各个时期的移民特征具有特别的意义。同时,该书还对移民引起的欧洲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比较好地构建起了国际移民体系的研究框架,即“欧洲移民的历史进程研究”“欧洲移民问题研究”和“欧洲移民的政策研究”(参见沈雁南 2008:163)。但

鉴于该书的拓荒性质以及著述的侧重点,该书对于移民融入等欧洲国家移民政策性问题的涉入较少。

国际移民政策本质上旨在解决排斥和融入问题,根据是否容许进入一个民族国家及外籍公民在该国是否拥有权力这两个方面来界定“本国人”和“外国人”,是一个控制外籍公民获得公民身份的过程。在决定谁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的过程中,国际移民政策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例如,法国以共和理念构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在移民政策上实施“共和同化模式”(马胜利 2003:107)。法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国所有公民,不分籍贯、人种和宗教,一律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不得保留。

除了法国外,其他欧洲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试图对国际移民进行同化,以减少族裔间的矛盾。例如,二战后初期,瑞典政府明确宣布以同化主义政策处理移民问题,要求移民要么离开瑞典,要么像瑞典人一样生活(Harald Runblom 1994:629)。但随着外籍工人的引入,瑞典移民群体日益多元,自觉同化事实上已不可能,瑞典逐渐向多元文化政策转变。瑞典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起被视为最早实现多元文化政策的三个国家,因此也是欧洲国家这一方面的代表,并经常作为多元文化的典范为人称道(Bundespolitische Bildung:Schwedens Integrationspolitik<sup>①</sup>)。

其实所有欧洲国家在国际移民融入方面,思维方式大同小异。在具体实施同化或者多元文化政策之时,欧洲国家对移民族群融入都有一个隐性的评估标准,并依据此标准把握宽严尺度。德国入境管理政策代表了这种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移民择选制度,有些人容易获得公民资格,有些人则难以获得公民资格,难易度取决于族群。

考察欧洲各国长期的移民政治实践,欧洲国家本质上一直采取以下治理方式:一、不承认自己的移民国事实,没有长远的移民政策,只有警察执法规范;二、对人群进行分化排斥,即只在特定的功能或目标下接受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是前来工作而不是永居;难民是前来短暂避难,而非入籍成为公民;他们

<sup>①</sup> <http://www.bpb.de/gesellschaft/migration/laenderprofile/57856/integrationspolitik>.

是个体而不是携带家庭或组成社区；是临时旅居而不是打算长期居住。许多中国学者指出，这种模式下外来移民原则上可以纳入特定福利体系，但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因此，那种多样性文化共存、族群相互认同、愿意在一个共同国家身份下尊重各自文化的多元文化社会要在欧洲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叶青、彭华明 2010，宋全成 2014）。

而与择选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穆斯林问题。鉴于历史和地缘因素，迁移欧洲以亚非穆斯林居多，而他们又多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欧洲主流社会普遍将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视为恐怖主义温床、国家安全的隐患。而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行为和文化符号被视为对社会的伊斯兰化，并上升为社会问题。再加之宗教极端分子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欧洲社会出现了一股较强烈的所谓“反伊斯兰化”运动。我国国内的研究也因此把欧洲穆斯林问题视为欧洲移民研究的重点问题（胡雨 2013）。这些研究大多在社会族群和文化视角下展开，注重族群关系和“人本”因素，试图探讨在恪守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的前提下，如何加强主流社会与穆斯林族裔彼此间的接触、对话与合作，如何借由循序渐进的方式使穆斯林真正融入欧洲社会，但对欧洲穆斯林问题深层根源的认识则力有不逮。另外，这些研究大多是单向度的，即从欧洲人的视角看欧洲人的问题，虽有对欧洲穆斯林不乏怜悯，也有对欧洲主流社会充分理解，但缺少从全体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角度提出全球治理方案，对我国的启示意义不大。因此，欧洲穆斯林移民研究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点问题，非要深入欧洲穆斯林社区，并且极为细致地梳理历史，才能把握住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实质。

迁移问题也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在欧盟的最初设计中，移民事务就是三大自由中的一个，并在之后的条约中上升为第一支柱。我国学者基本上同意欧美学者对欧盟移民法律体系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说一体化移民政策通过共同准则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外国人法”（朱虹 2004：108）。田德文则注意到了移民对于欧盟社会政策的认同问题。在《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一书中，他对如何在超国家层面上的欧盟社会政策与各民族国家采取的措施之间进行合作与协调，以及“欧盟社会政策体系”的“多层治理体系”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个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将‘治理’与传统民族



国家的‘统治’结合起来,具有多层次、多中心、网络化的特点。”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田德文进一步提出了移民问题研究中的移民认同、人员自由流动和社会融合方面的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警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移民流入量已经超过北美,给欧盟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欧盟移民主要是因政策导向而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大量流入,其消极面在90年代后日益突出。这些移民在经济上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受害者,在政治上则成为因失业问题而引发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受害者(田德文1999:62)。田德文所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对我国的国际移民管理实践具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

以上我们以针对欧洲国际移民的部分不同观点和研究问题串联起涉及本书几个章节的切入点,并通过这条思想线引出本书的三个研究问题:

1) 尽管欧洲自有人居以来就从未间断大面积的迁居活动,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产生加拿大、美国式的“马赛克”社会?

2) 为什么欧洲各国始终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并且每一个国家都存在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趋势?

3)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欧洲国际移民治理方案可供参考?

前两个问题一直以来也是欧洲国际移民研究要回答的重要问题,而最后一个问题一直无解。求索三个问题在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之时,也爆发了反移民、反难民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发生了英国脱欧事件,更引发底层劳工阶层对当权者的严重质疑和坚决反抗。

## 二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

针对“迁移”这一大多生物的种属特性,以及只有人才具有的这种社会特性,国际移民理论层出不穷,论著汗毛充栋,更有诸如《国际移民评论》和《国际移民》等专业杂志持续发表相关论文论证人类迁移现象。在欧洲,除了欧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网络渠道发布移民相关政策和研究成果之外,各国移民和难民局也通过招标等方式就移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发表在网站上。

总体来说,国际移民研究无非针对移民迁移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迁移前的决策阶段、迁移中的流动阶段和迁移后的融入阶段。而针对这三个不同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主流理论。

基于人们对人口自然流动因果关系的认识,国际移民研究有颇为盛极一时的“推拉理论”(Ravenstein, E.G. 1885)。按照该理论,人们往往因为生活条件的驱使而选择自愿迁移。影响着人们迁移决定的生活条件包括人口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社会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文化因素、教育和社会资源因素等。在这些问题中始终存在着所谓“推因”和“拉因”。“推因”指原居住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令人不满,从而产生了迁移的动力,“拉因”则指人们想象在它域生活更好,就此来看,“推因”和“拉因”本质上并无二致,只是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综观学术界运用推拉理论进行的研究,该理论的核心其实是经济性因素,它们如同迁移背后的“看不见的手”,驱使人们做出迁移选择。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推拉理论”。按照人口理论,地区的人口增长无序以致过剩,如果人口不加以限制,更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这些新增人口能从土地上获得的产出增量相当有限,这必然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并导致饥荒或人口外迁(塞尔斯 2011:41)。该理论从以下现象中得到证实,即世界上的人口迁移一般都是从人口稠密区迁至富饶、产出更高的人口稀薄区。“推拉理论”的简易模型框架能让研究者解释过去历史上人口自然流动的成因,并给予研究者填充的想象空间(李明欢 2000:13)。

虽然推拉理论影响甚大,但对它的批评也从未停息。批评者认为,传统推拉理论完全不考虑迁移中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无法解释原先的推拉因素改变后,迁移行为依然持续的原因,还无法解释推拉因素虽然没有变化,但迁移行为却会停止的原因。再有,如果推拉因素是人们走上迁移之路的主要动力,那么为何有一部分人愿意迁移,而另一部分人却安于现状?最后,如果真存在这么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又如何解释很多实际上只是一时头脑发热的迁移行为?对推拉理论的反思,推动了国际移民理论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际移民研究产生了众多新的移民研究理论,提供了各式看问题的新视角。这些理论已经不再只是研究国际移民的动因,而开始研究国际移民延续

性的迁移和社会适应的问题。

针对国际移民延续性的问题,国际移民研究理论认为,移民是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选择的结果。其中的重要选择就是民族和文化认同感,狭义上表现为亲情和乡情。人的天然社会属性驱使人们聚集一起,而亲缘、乡情和情缘扭结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到达异国他乡,这种人际关系并不会中断,而它也与导致移民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无关。比如 50 年代来到西欧的土耳其客籍男性工人,起先只身一人来到西欧,随后再把妻子、孩子接来。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信息传播更快,移民成本更低,从而更加推动源源不断的移民潮。根据格勒密纳·亚瑟(Guille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兹维格(Mark Rosenzweig)的研究,移民十年后每个新移民平均带来 1.2 个劳工类新移民(引自李明欢 2000:14),而通过家庭团聚政策来到目的国的亲属应远远高于此数字。根据对欧洲移民走向的观察,始终可见以上言及的、发生在世界各地人口迁移潮中的普遍规律:一人移民,往往引来家人、熟人、同乡追随,形成所谓“链条移民”。链条移民是欧洲人远距离迁移的典型特征,是迁移源源不断的关键性机制(梁茂信 2011:10)。

另外,国际移民研究还发现,导致移民的有以下几种倾向:身边有较多移民的人也会倾向移民;有过移民经历的人会比较容易再次移民;没有外国汇款收入的人会受到有汇款家庭的刺激而移民。对华人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华人移民在新的土地上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他们在目的国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功的移民为家乡年轻人做出表率,激励年轻人踏着前辈的脚印到国外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家庭挣荣耀。目前这种以“侨乡”概念为标志的研究范式已经为国际移民研究所重视(比较李明欢 2000:15)。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当代国际移民动因最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收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国家人民的收入差异越大,则贫穷国家人民的移民比率就越高;二是所在移民接收国特定外国族裔群体的大小。特定某外国族裔群体越大,则该族裔新移民潮就越大,同时该族裔被主流社会融合的比率也越小(Paul Collier 2013:43-47)。保罗·科利尔以东亚国家的发展说明,消除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才是解决当前移民潮的正途。他为消除贫困开出良方,要改变一个国家的贫穷,必须首先建立社会